

# 編後語

隨着數字技術的發展，平台經濟在中國急遽崛起，深刻影響社會各階層的日常生活，數字勞動者的權益問題尤其備受關注。本期「二十一世紀評論」以「平台經濟：美麗新世界？」為題刊發三篇文章，從不同角度思考平台用工存在的種種問題。汪建華詳細剖析了在平台經濟大行其道下，當前中國靈活用工擴展的多重作用機制，認為其深遠影響並不限於平台用工，同時塑造了製造、物流等相關行業的運營方式，在社會層面擴散組合市場要素經營思維，形成「去勞動關係化」的趨勢，對勞動者的權益保障構成巨大挑戰。孫萍等人的文章指出，處於弱勢的平台勞動者雖然困在「系統」之內，但仍然存在「另類數字實踐」的可能。他們憑藉對數字技術的掌握，既能通過動員集體反抗、建立信任同盟等方式，以受害者的形象爭取輿論支持，亦能祭出「弱者的武器」，打破物理空間的限制，建立數字化勞動者聯盟，挑戰「算法黑箱」。不少論者認為平台經濟的特點是低成本、高效益，吳清軍強調中國的平台用工屬於一種「輕資產、重運營」的商業模式，無論是交易成本抑或社會成本都十分高昂，平台從創立之初即建立起一套規避勞動、稅務以及社保監管的措施。平台用工治理因而並非單純的勞動關係問題，必須轉向綜合性社會治理，才能正本清源。

本期「學術論文」欄目刊出三篇論文，主要討論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政治思想文化的變遷。文化大革命結束後，中共「撥亂反正」，致力處理文革歷史問題，宋國慶借用「轉型正義」(transitional justice)的分析框架，深入探討人事清查、司法審判、平反和賠償等舉措的作用與意義。文章指出，撥亂反正是以修復性為主、兼具懲罰性特徵的和解過程，為中國對外開放創造了穩定的內部環境。任希鵬梳理了文革後圍繞階級問題的爭論，認為有關爭議形成了80年代階級理論中的兩個面向：革命與治理。隨着90年代市場經濟的發展，階級鬥爭轉向社會治理，階級理論的革命面向被「懸置」，在去政治化的背景下，階級理論實現社會科學化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革命面向在新時代下似有捲土重來之勢。馬郝楠以二十世紀末中國思想史書寫為中心，詳細考察80年代以來「現代」敘事的內在脈絡嬗變及其崩解的危機。文章認為，中國思想史敘事危機的關鍵在於「現代」在敘事中的位置。弔詭的是，「現代」既是80年代思想史敘事建構的來源，也是80年代以來思想史敘事崩潰的原因。

張寧與以研究微觀史和全球史享譽學界的英國歷史學者沈艾娣(Henrietta Harrison)進行了兩次深度訪談，除了談論她的學術生涯點滴以外，還揭窺其有關1949年中國的歷史研究計劃。本刊分兩期連載，以饗讀者。